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

杜迺松 著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

杜迺松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杜迺松著.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10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ISBN 7-80047-439-9

I. 吉… II. 杜… III. ①金文-文集②青铜器
(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7.34-53②
K876.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1923 号

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

杜迺松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390 千字 印张 25.25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ISBN 7-80047-439-9/K·203

定价: 65.00 元

目 录

上编 吉金文字考释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金文考察·····	(1)
青铜器铭文中的金属名称考释·····	(12)
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7)
金文的发现与先秦史研究·····	(30)
金文“容”字考释·····	(34)
古亚毁与寓鼎铭文考释·····	(38)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41)
邕其三卣铭文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46)
克盂克盨铭文新释·····	(58)
史墙盘铭难字解释和周初史事·····	(63)
荣毁铭文考释及其意义·····	(66)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德”字·····	(70)
春秋吴国具铭青铜器汇释和相关问题·····	(77)
对“五年复吴”“君幸酒、君幸食”的考释·····	(84)
读“三年相邦铍”铭文随笔·····	(87)
“巴蜀图语”中壘尊的解释·····	(89)
金文句鑕左守讨论·····	(92)

中编 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99)
论中国早期铜器中的若干问题·····	(118)
论夏代青铜器·····	(131)

论春秋战国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	(136)
论先秦时代南方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	(155)
论青铜文化中的青铜生活用器·····	(166)
论黔桂滇青铜器·····	(174)
谈江苏地区商周青铜器的风格与特征·····	(180)
论巴蜀青铜器·····	(186)
论东周燕国青铜器·····	(192)
东周时代齐、鲁青铜器探索·····	(200)
论中山国青铜器与隋唐时期的青铜器综论·····	(209)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察·····	(229)
论《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中的青铜器·····	(236)
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考·····	(240)
论青铜鸟兽尊·····	(244)
青铜器定名的几个理论问题·····	(257)
从湖北崇阳出土的兽面纹铜鼓谈起·····	(262)
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	(265)
青铜钺的初步研究·····	(269)
论列鼎制度·····	(276)
青铜匕、勺、斗考辨·····	(283)

下编 青铜工艺与青铜器鉴定

古代青铜艺术论·····	(291)
谈近年商周青铜器花纹研究的新进展·····	(299)
战国铜镜初探·····	(304)
中国古代铜镜述略·····	(315)
论近年新出铜镜的意义·····	(321)
简论秦代青铜器铸造业·····	(328)
先秦两汉青铜铸造工艺研究·····	(332)
两汉时代青铜冶铸业与科技考古·····	(341)
赴豫鉴定青铜器综论·····	(351)
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	(361)
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	(367)
青铜器鉴定定级标准理论与实践·····	(384)
科技考古在青铜器研究中的意义·····	(395)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金文考察

近年来，笔者有幸赴全国各地对国家各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的青铜器进行鉴定，见到大量多年来新发现的重要金文，并得以摩挲审视。

以下就其中历史价值较高的商周至两汉的金文，进行论述。

一

青铜器在我国起源很早，但何时始有铭文，这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商代前期（二里岗期）青铜器被文物考古界确认后，这一问题的解决开始明朗。河南郑州白家庄二里岗期的二号墓，出土铜鬯的颈部有 3 个龟形图案^①。有学者指出，该图案就是“𪚩”字，是氏族徽号^②。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鬲上有一图文，该图文可认定为“亘”字^③。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以上图文应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器铭文。铭文多表现为图画文字，是代表某一家族族徽的一种特定符号。这些铭文在文字学上自然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以安阳殷墟出土铜器为代表的殷商后期青铜器，不但铸造浑厚凝重，装饰精美，而且器上铭文也较普遍，有一字、二三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不等。一个字的多为族氏名，近年新出土的仅具族氏名的铜器颇多，重要的如：1980 年在豫南罗山县蟒张出土殷墟二期至四期的大量青铜器中，26 件有“息”字铭^④，表明蟒张基地为“息”族墓地，为研究淮河流域的商代族氏分布具有一定意义。1961 年河南温县出土的商后期铜器，方鼎、爵、斚，铸有“𪚩”铭^⑤。1991 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出土的商后期铜器有“又”和“戈”铭^⑥。1969 年在山西石楼义牒出土的一件戈的“内”部后端，有一“𪚩”铭^⑦。山西灵石旌介村 1985 年发现的二号墓铜器上大多有“𪚩”铭徽记^⑧。1973 年陕西省岐山贺家村出土的铜器，有的有“庚”、“山”、“𪚩”铭^⑨。1970 年湖南宁乡黄材发现的铜卣有“戈”铭，等等。殷商后期的这些单名族徽的发现，有其重要历史价值。首先是对研究这些族氏或方国的历史，包括迁徙和融合史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有的族氏铭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如罗山蟒张的“息”铭，为研究族氏史增添了新资料。而

石楼义牒的“𠄎”铭，字的结构像一颈上带刑枷的人，被囚在牢房内。这与1969年山西侯马发现的战国殉葬墓，殉葬人的颈上还有铁颈锁，正可互补，对研究殷商刑法和政治具有一定价值。

商代铜器上有的族氏名是合体字，如：1966年山东益都苏阜屯出土的青铜大钺有“酓亚”铭族徽，安阳殷墟五号墓出有“亚其”、“亚启”铭族徽。对具有“亚”铭的族氏的解释，不同的说法很多，但从铜器铭文和《尚书》内的“大亚”、“多亚”等名看，有学者提出具有“亚”铭族徽的物主人应是外服诸侯，还是较为合理的。新发现的“酓亚”、“亚其”等铭文铜器，无疑可以进一步提高传世铜器中同铭器物的科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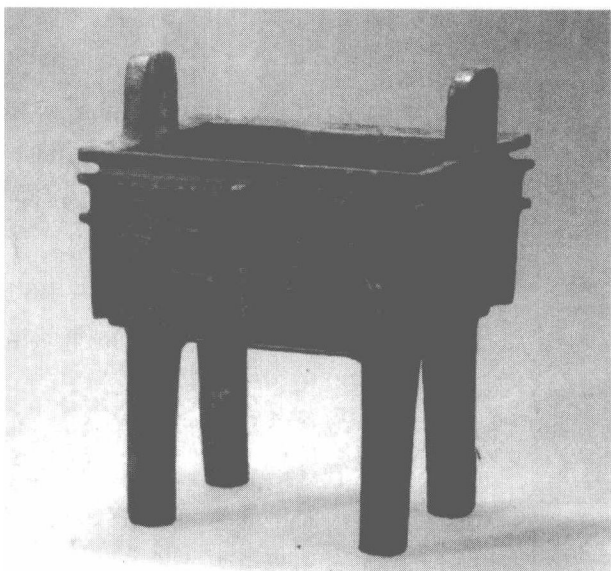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铜器简略铭文中，不少都标明了为祭祀祖、妣、父、母、兄而作器。1976年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了“司母辛”、“司母癸”铭铜器，尤其是“司母辛”铭的发现，为深入研究闻名于世的“司母戊”鼎的年代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司母戊”铭书体与“司母辛”铭书体等方面相比较看，司母戊鼎的年代可以提前到殷墟等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⑩，提前了几个王世。

众所周知，殷商后期铭文在二三十字以上的铜器极少见，其中主要有：今藏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的小臣艮犀尊，铭文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癸卣盖、器，铭文47字；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肆毁，铭文36字。商代后期铜器长铭内容除表现祭祀之外，还有赏赐、征伐、宴飨、狩猎等多方面内容。令人欣喜的是，近年陆续新出和新发现了有较长铭文的殷商后期铜器，如1959年河南安阳后岗出土的戌嗣子鼎^⑪，铭文3行30字：“丙午，王赏戌嗣子贝廿朋，在囿宗，用作父癸宝鬯。佳王甌囿大室。在九月。犬鱼。”铭文中的“鬯”字，从“匕”，表明鼎、匕相配。《说文解字·匕部》：“匕亦所以用匕取饭，一名柶”。鼎匕相配，表明饭应包括素食与肉食两大类。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古越阁收藏的一件商代直内戈的内部铸一族徽，其形象是在一鼎上站立一人，推测鼎上之人形，可能是古代叉取食物用的“匕”的另一种写法，这是在金文中“人”与“匕”通用的实例。至于戌嗣子鼎铭末的“犬鱼”二字，应为一种复合族氏铭。铭文整体内容是商王在囿地大室对戌嗣子赏赐贝廿朋。

1982年山西汾河下游的曲村商周文化遗址81号西周早期墓出土一件方形有铭鼎（图一），鼎内腹壁铸铭26字，内容是器主甯孚得到商王赏赐后，作纪念父辛和祖甲的祭器。从铭文推测，器主甯孚是商王同宗族人，祭祀的是商王武乙和廩辛，铭文所记“唯王廿祀”就是商王武乙二十年，因而该器应是武乙时代的。商王室器物之所以能到周人手里，应与西周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有关。

值得重视的是，山东省菏泽市文化馆在1952年收集到一件商代辛甫卣，实为以往著录过的辛甫毁^⑫。该卣器与盖对铭。3行23字：“王来兽（狩），自豆录（麓），在禠。王飨酒。王光（赐）辛甫贝五朋。用作宝鬯。”铭文内容同时反映了三件事，即狩猎、宴飨和赏赐，这在商铭中是难得见到的。

近年新出殷商后期青铜器铭文，对深入研究商代家族史、方国史、祭祀制度、思想



图一 商后期 霁斚方鼎器与铭文

意识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史料。

二

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西周时期比商代更有过之。贵族的重要事要“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⑩，《礼记·祭统》亦云：“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墨子·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从文献记载看，贵族在铜器上铸刻铭文，总的目的是称颂先祖的功德。先秦铜器铭文中，以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最多，上百字的长篇亦多，早就受到了金石学家的重视。近 50 年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许多都有铭文，铭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是研究西周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

1954 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的宜侯矢卣，铸铭 126 字，其铭有：“王命虞侯矢曰：□侯于宜。……易土，戍川百□……易在宜王人十又七生（姓）。易奠七白，戍夫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是康王改封虞侯矢为宜侯，并赐器物、土地、山川和奴隶的记载。周王赏赐宜侯矢的农业奴隶“千又五十夫”的这一数字，恰与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出土的大盂鼎铭所记康王对贵族孟赏赐奴隶数目相同。1964 年北京房山琉璃河 M52 出土的复尊铭文有“匱（燕）侯赏赐复冕衣、臣妾、贝”^⑪内容，所记“臣妾”即男女奴隶之名称。“臣妾”同赐，在铜器铭文中还是少见的。而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几父壶铭记几父受到上司同仲“仆四家”的赏赐^⑫。1980 年山东滕县后荆沟出土的西周不斁卣铭文 151 字，铭文内容表明器主因征战有功，受到周王的嘉奖，其中包括“臣五家”的赏赐^⑬。上述赏赐的奴隶是以家为单位。这一家包括多少人，还需新的资料来证明。

以上所举的“臣”、“妾”、“仆”等都是奴隶名称。《周礼·地官》：“质人掌成市之货



图二 西周初期 旃鼎铭文

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使者，质剂焉。”反映了奴隶制度的残酷性。近年新出有关奴隶被赏赐的铭文，可与文献和传世品的铜器铭文相互补证。

新出铜器铭文中，有不少反映西周土地制度方面的内容。

西周社会土地属于天子一人所有，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可以把土地赏赐给诸侯和臣下，让其世代享用，但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要定期交纳贡赋，周王还可随时收回土地。新发现的铜器铭文，不少都记载了赏赐田地事，如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成王时的旃鼎铭有“王姜易旃田三于待割”^①。“田三”即三田，一田等于一百亩，三田即三百亩。王姜不但赏赐给旃三百亩田，而且还包括了田内即将成熟的禾稼（图二）。1969年陕西蓝田出土西周共王时期的永盂，铭文12行，123字^②。铭文记周王赏赐大臣师永田地事，“锡矢师永毕田阴阳洛疆罍师俗父田”。而赏赐师永田时，则是由益公带领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大臣来完成王命的。由此不难看到，周王朝对赏赐国有

土地的重视。山东滕县后荆沟不斲毁铭，记周王赏赐不斲“田十田”。江苏丹徒烟墩山宜侯矢毁铭记周王赏赐矢“田川”和“宅邑”。这些铭文资料，对研究西周时代国有土地占有形态极其重要。

众所周知，在传世的一些西周有铭铜器中，如格伯毁、散氏盘、鬲从盨等，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私人土地的占有，冲开了国有土地的禁锢，奴隶制在逐渐走向衰落。新出铜器铭文，增添了这一方面的新资料。最重要的是，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几件西周中期卫器铭文^③，其中包括卫鼎甲铭文207字，卫鼎乙铭文195字，卫盂铭文132字。卫盂铭中记载了矩伯庶人从裘卫处索要了朝见周王子的玉璋，其价值为八十朋



图三 西周初期
利毁铭文

贝，而矩伯庶人给了裘卫一千亩的土地作为玉璋的代价。即铭文所记的“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阜貯，其舍田十田”。卫鼎记执政大臣同意邦君厉租给裘卫四百亩田，并让官员踏勘租田的四界。从铭文内容可知，有关双方在换取田地时，要向宫廷执政大臣报告，同意后才能成交。这说明虽然土地私人占有已经出现，但在名义上土地还是国有的，因此在形式上还要得到宫廷的同意。卫器等铭文说明在西周中期以后，土地制度已经开始变化，在奴隶制社会内部已开始出现封建制的萌芽，这对研究奴隶制社会经济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极其重要。

战争是西周国家的重要大事，鉴定中所见新出铜器铭文中不少都反映了这一内容。1976年陕西临潼县西段窖藏出土的利毁铭（图三），铭文32字，内容简朴，开首有“珷征商”三字，明确记载着西周武王征伐商纣之史事。重要的是，铭文中所记伐商时间是在“甲子朝”，这与《逸周书·世俘解》“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所记伐商时辰完全吻合，证明古籍记载正确可信。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前段在歌颂西周王朝已故的文、武、成、康、昭、穆和当朝的共王各王时，其中对昭王的颂辞是：“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狩南行。”^②明确记载了周昭王一生的重要功绩是伐楚荆，这与史书所记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两次大规模伐楚是相吻合的。昭王十九年伐楚还死在了汉水中。史墙盘铭的记载解决了学者间长期以来对伐楚荆是成王，抑或是昭王的争论。

传世铜器铭文许多都反映了西周国家征伐西北强族獫狁的战事，典型的如康王时的小孟鼎、孝王时的虢季子白盘。1980年陕西长安县下泉村发现的多友鼎，内壁铸铭275字^③。鼎铭记周厉王时獫狁侵犯京师，以及荀等地，厉王委派武公部下多友与进犯者多次进行战斗，结果多友所率部队杀死敌人“二百又五人”、“三十又六人”、“百又十又五人”，计350余人。俘获敌人“执讯廿又三人”、“执讯二人”，并缴获敌人大量兵车与物品，仅在鄠地就“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由此可见战争激烈之程度。

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的Ⅱ式戎鼎，内壁铭文115字，Ⅰ式戎毁盖器对铭，文134字^④。戎鼎铭文记载了戎征伐淮戎事，铭云：“周天子，肇使乃子戎，率虎臣御淮戎。”戎毁铭文记“戎伐戡”地，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馘百，执讯二夫”，等等。

新出土西周铜器铭文有关战争与征伐的记载，是研究奴隶制国家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与奴隶。

新出土西周金文有的反映当时贵族的有关礼仪，这与文献记载的西周礼仪制度多，而且相当完善是相一致的。1954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发现的穆王时的长由盃铭：“穆王在下 殽应，穆王飨醴，即并伯大祝射。”^②铭文中的穆王属生称。铭文记载穆王在下 殽行屋行飨射之礼。在反映礼仪制度上更富特点的是，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盩驹尊铭文，记载了执驹之礼，“王初执驹于欣……王亲旨盩驹，易两。”这里周王亲自参加幼驹长大脱离母马，正式作为畜力使用时所进行的“执驹之礼”。从中也反映了周王朝对马政的重视。驹尊铭内容可与《周礼·夏官·校人》等有关执驹之礼相互补充。

与传世重器大孟鼎铭文内容性质相雷同的何尊铭文，其性质同属铭名中的训诰一类。所谓训诰，即天子对臣下的某种命令或告诫。从文献和铜器铭文看，西周时代，训诰时一般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因而也就成为某种礼仪。何尊铭文是周成王五年对宗小子的一次训诰，铭文云：“王诰宗小子于京室”，让宗小子努力继承先辈，以效忠于王室。铭文还谈到武王与成王相继营建成周洛邑的一些情况。河南洛阳是西周王朝的东都，周公东征时，营建东都洛邑。平王东迁后则为国都。《书·洛诰》云：“我乃卜涧水东，澍水西，惟洛食。”何尊铭文内容可与古籍相互参证。

新出铜器铭文，有的记述了西周王朝对诸侯的分封，如北京房山黄土坡西周 1193 号大墓出土的克盂、克盃铭文，两器铭文内容完全相同，并均为对铭。铭文有“命克侯于匭”句，反映了周天子对燕国的分封，证明《史记·燕世家》记载的“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史实是完全可信的。而今天的房山琉璃河一带即为西周燕国都城所在地。

山西省天马一曲村北赵晋侯及其夫人墓出土的有铭铜器中，“晋侯稣”、“晋侯𣎵”、“晋侯邦父”等铭文的出现，对研究西周时代晋侯世系很有价值，可补充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还值得一提的是，北赵 63 号墓出土的一件壶铭“杨姑作羞醴壶永宝用”，对史书失载的西周杨国史是一重要资料。宝鸡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出土的带有“彊伯”、“彊季”等字样的铜器铭文，对研究彊方国历史与地理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资料。

近年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铜器铭夏，所见重要的如：虢国墓地除 20 世纪 50 年代出土的有虢太子等铭文的器物外，1990 年又发掘了编号为 2001 号的大墓，许多铜器上还镌有“虢季”字样的铭文，进一步表明了今河南上村岭就是虢季氏的家族墓地。关于虢季这一支史书没有记载，但传世的不少铜器铭文则见“虢季”铭，有名重器虢季子白盘即是显例。2001 号墓出土的编钟铭有“用义（宜）其家，用兴其邦”的话，因而可推测其墓主人，很可能是北虢虢季氏的某代国君。

1984 年河南省平顶山北 洼村发现的应国铜器铭如：“应侯作旅鼎”、“应侯作旅斝”，表明这些青铜器系应侯自作。特别是其中的 4 件斝铭都有“邓公作应嫫毗媵斝”内容，反映了应国与邓国的联姻关系。《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邰、晋、应、韩，武之穆也。”从中可知应国是武王子的封国。国都地在今平

顶山市西 20 公里的薛庄乡 湍阳镇一带。应国铜器在 1958 年江西余干出土过应监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74 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了一件应侯仲, 在两甗和甗间都铸有铭文, 从该钟铭尾看, 文字未完, 但铭文内容与今收藏在日本的一件应侯钟铭文可以连接起来, 说明它们原本是一组编钟的两件^②。西周应器的发现对研究应国历史增添了重要资料。

此外, 还有河南信阳 浉河港出土的西周“郟国”器^③, 1979 年河北省元氏县发现的臣谏毁、叔趯父卣和尊的铭文^④, 对研究西周邢国历史、地理位置, 与史无征的抵国, 以及邢、抵与北戎之关系, 都给人以新的认识。

许多新出西周铜器铭文都反映了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 其中包括祭祀、天命和德治等。祭祀是西周国家的重要大事。1978 年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出土的猷毁, 是周厉王为纪念祖先而作的祭器, 铭内有: “猷作鬯彝宝毁, 用康惠联皇文刺祖考, 其各前文人”。猷毁有: “对扬文母福刺, 用作文母日庚宝鬯毁” 铭, 这是器主猷为死去的母亲日庚所作祭器。1984 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的井叔钟, 有铭文 7 行 39 字, 记井叔为文祖穆公所作此钟, 并祈求福禄。近年新出的不少铜器铭文, 都反映出贵族对祖先的“追孝”、“享孝”。在宗法制度下, 统治阶级以此为目的就是要继承和维系血缘宗族关系, 以巩固和确保奴隶制国家的统治。

反映统治阶级“德治”思想意识的铭文, 最具典型的莫过于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的师卣鼎铭。全铭多处提到德, 对德的提法, 有“孔德”、“烈德”、“懿德”、“胡德”、“安德”、“介德”。这些不同名称的“德”, 总的诠释都是“美德”义。铭文中所见“德”的提法还很多, 西周贵族社会“德”这一伦理观念已相当成熟。“德治”是属于“礼治”的重要内容, 也是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 因此也是用来维护尊卑贵贱, 进行教化的重要统治手段。

新出西周铜器铭文, 还有法律诉讼方面的内容。1975 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猷匱铭文 157 字, 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一篇法律判决书, 铭文大意是牧牛(人名)与其上级叫猷的为五个奴隶而发生诉讼, 法官伯扬父判辞说牧牛犯上, “女(汝)敢以乃师讼”, 并说按照牧牛的罪行, 应该“佻(鞭)女(汝)千, 幪黜女(汝)”, 即鞭打一千鞭和予以墨刑。又说: “今大赦汝, 鞭汝五百, 罚汝三百孚。”即对牧牛大赦而减刑, 只鞭五百, 罚三百孚的铜。铭文内容可与《尚书·舜典》“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金作赎刑”、《国语·齐语》: “薄刑用鞭扑” 互补。猷匱铭文对研究西周时代法律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以上不难看出, 新出西周铜器铭文, 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史、文化史, 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三

一般说, 东周时代青铜器铭文, 没有西周时代那么重要, 铭文内容大多反映某诸侯

国铸器，这对研究不同诸侯国家历史、铸器特点、铸器风格提供了依据。铜器铭文多程式化，如祭祀、媵器，以及兵器上的题铭，反映武器制作作坊或某地制造、督造者和物勒工名等。长篇铭文少见，传世的齐叔夷钟一组器上共 492 字，实属罕见。但近年也出土一些长铭东周青铜器，价值很高，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

1978 年陕西宝鸡杨家沟窖藏出土的秦公钟和秦公镈^⑦（图四），甲、乙钟一组铭文和丙、丁、戊钟一组，以及 3 件镈钟的每件镈的铭文内容全同，每组铭文 135 字，铭文开首：“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刺刺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彡于上，邵合皇天，以就事繇方。……”铭文对研究秦国诸侯世系很有意义。从铭文推定，一般认为，钟与镈的主人是秦武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697 年～前 678 年。

1979 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 2 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鼎腹铭鸟书 86 字^⑧，铭文记载王子午“用享以孝于我皇祖考”，并“惠于政德”。发掘者认为王子午即楚国令尹子庚，死于楚康王八年（公元前 552 年）。铭文反映了作器祭祀和对当政的颂扬。

1957 年在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编号为墓 1 的楚墓中，出土编钟 13 枚，首钟上有铭文：“唯型篇屈柰晋人救戎于楚竟”^⑨，记公元前 525 年晋国灭陆浑戎事。

1955 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盘、镈等器，其上铭文许多都近百字^⑩，从铭文可知，蔡国处在楚、吴两大国间的困境，蔡侯既要“佐右楚王”，又要嫁姐以“敬配吴王”。蔡器铭文对研究蔡国与吴、楚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湖北省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在钟体和钟筭、钟钩等上，计有铭文 3755 字，而且许多都是错金的。铭文记载了有关乐理的内容，如音律、音阶的名称和变化音名，以及曾国与楚、周、齐、晋的律名、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些铭文内容，对认识、研究战国时代音乐发展水平提供了罕见的资料，是世界文化史的瑰宝。

1974 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期中山王墓出土的几件长铭铜器格外重要，主要包括 469 字的中山王𡈼鼎、450 字的夔龙饰文壶、204 字的𡈼罍圆壶和 450 余字的兆域图铜版^⑪。文献记载中山国史少而零散，因而这些长篇中山国铜器铭文，使我们今天得到了解开中山国历史之谜的钥匙。中山王𡈼鼎铭与中山王𡈼方壶铭内容雷同。铭文记载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将君位让给相国子之事。鼎铭云：“昔者郈君子遄，睿寡夫悟，𡈼为人宗，闻於天下之物矣，犹𡈼（迷）惑于子之，而𡈼（亡）其邦，为天下戮。”方壶铭：“匿君子遄，不顾大义，不救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其铭可与史籍相互印证。文献记载，由于哙让位于子之，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聚众进攻子之，燕国大乱。这时东方的齐国趁机伐燕，攻占燕都，哙与子之均身死。作为与燕国相邻的中山国对燕国内乱持什么态度，文献并未记载。而中山器铭则记载了在这一事件中，中山国在相邦司马𡈼率领下参加了征燕的战争，方壶铭：“𡈼愿从在大夫，以清郈疆，是以身蒙𡈼（甲）冑，以诛不顺。”鼎铭云中山国在征燕战争中，还“辟启封疆”，获得了燕国“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的大片土地。𡈼罍圆壶铭说相邦司马𡈼“率师征郈，大启邦河，方数百里”。𡈼罍圆壶铭是王𡈼之子𡈼罍追念其父王的一篇悼词，铭文有“以追庸



图四 西汉 铜鑲金竹节熏炉
铭文

(用)先王之工(功)烈”。3件铜器铭文对研究排比中山国王世系也有很大价值,可以排列出文、武、桓、成、馨、紆蜜中山国王的世系。这几件长铭补充了文献的空白。王馨墓出土的铜版用金银嵌成的铭文宫堂图,是我国目前所仅见最早的古代墓葬规划图,即“兆域图”,从而证明了《周礼·春官·冢人》记载“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的可靠性。由于铜版开首有“王命珣为兆法”字样,因而也有学者依据器物“名从主人”的定名原则,将该铜版的墓葬规划图称作“兆法图”。

四

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制作铜器目的的不同,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青铜器铭文发展脉络的总体上看它已走向衰落。

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统一措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近年发现的秦代量器或衡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除有一般常见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者外,较重要的还有西安西郊高窑村出土的高奴铜权,权上有阴文铭6行16字:“三年,漆工配,丞诎造,工隶臣平。禾石。高奴。”权上加刻有始皇廿六年诏文和二世元年诏文,二世元年诏文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1950年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出土的一座秦墓内,在铜毁上,有一小篆“轨”铭。据研究,这里“轨”字应是“毁”的假借字。1976年,在始皇陵封土建筑遗址内,发现一件错金银铜钟,钟钮刻小篆“乐府”二字^③。这一发现可以纠正《汉书·礼乐志》所记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的说法。秦“乐府”钟铭的出土,将乐府机构的建置提前到了秦朝。

两汉时的青铜器铭文,许多都较清楚地记载了官营

手工业机构的名称和官吏设置,以及物勒工名等情况,尤其是官营机构名称,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和补充。近年大量出土的规矩四神纹铜镜,其上常铸“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铭,这种铜镜是“尚方”所造。《汉书·百官表》载汉中央政权机构设“少府”,机构内设“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和“尚方”,铭文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正确。陕西兴平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铜鍍金银竹节薰炉,有铭文(图四):“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薰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薰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④铭文中的“内官”和“寺工”都是汉代的官方机构名称。“寺工”机构早在秦代已出现,如新近秦俑坑出土的铜铍铭“十七年寺工鉞,工写”,反映了汉承秦制的一个历史侧面。

新出的一些汉代铜器,从铭文可知该器属于某宫、某府,这为研究汉代历史和高级府第的设置,以及历史地理都有着一定的价值。例如竹节薰炉上有“未央”名,表明该炉是皇家“未央宫”所用。“阳信家”铜器,是汉武帝长姐阳信长公主家所用铜器。1961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一批计22件窖藏铜器,有的有“上林”名称,如“上林铜鉴”,表明这批铜器是属上林苑皇家官馆所有。高窑村有的器物上还有“乘舆”铭,《独断》载:“乘舆出于律。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用者也。’”因而可知,有“乘舆”名的器物,应为天子所专用。另外,“中山”、“常山”、“晋阳”、“清河”等铭文器,说明该器物归属某王府。还需注意的是,汉代铜器铭文内容,有的还反映了私家手工业的存在。如1968年河北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些铜器,其上铭文表明“中山内府”的有些铜器是从洛阳和河东买的,即这些铜器是私营手工业作坊专门铸造的。有的铜镜镜铭上有作坊主的姓氏,如纪氏、袁氏、吕氏、叶氏等。私营青铜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是与当时豪强地主势力的强大分不开的,反映了社会内部势力增长的一种新变化。

总之,近年所见新出商周、两汉青铜器铭文数量多,内容丰富,可印证和补充历史文献,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极为宝贵的文物资料。

①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

②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7期。

③ 石志廉:《商戊鬲》,《文物》1961年1期。

④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⑤ 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

⑥ 《定州市发现大型商代方国墓葬》,《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8日1版。

⑦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72年4期。

⑧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 ⑨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
- ⑩ 杜迺松：《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文史哲》1980年1期。
- ⑪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1期。
- ⑫ 菏泽市文化馆：《殷代长铭铜器宰甫卣的再发现》，《文物》1986年4期。
- ⑬ 《墨子·非命》。
- ⑭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 ⑮ 《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
- ⑯ 万树瀛：《滕县后荆沟出土不斲斲等青铜器群》，《文物》1981年9期。
- ⑰ 史言：《眉县杨家村大鼎》，《文物》1972年7期。
- ⑱ 唐兰：《永孟铭文解释》，《文物》1972年1期。
- ⑲ 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5期。
- ⑳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期。
- ㉑ 田醒农、雒忠如：《多友鼎的发现及其铭文试释》，《人文杂志》1981年4期。
- ㉒ 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或诸器》，《文物》1976年6期。
- ㉓ 郭沫若：《长由盃铭释文》，《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 ㉔ 韧松：《〈记陕西蓝田县新出的应侯钟〉一文补正》，《文物》1977年8期。
- ㉕ 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信阳县 洧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考古》1989年1期。
- ㉖ 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1期。
- ㉗ 卢连城、杨满仓：《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罍》，《文物》1978年11期。
- ㉘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㉙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
- ㉚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 ㉛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 ㉜ 杜迺松：《洛阳西工出土的几件铜器》，《文物》1965年11期。
- ㉝ 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 ㉞ 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9期。

原载《先秦·秦汉史》2002年2期

青铜器铭文中的金属名称考释

商周金文中常有金属名称。金属名称的出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金属名称在铜器铭文内的出现，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用某种或某几种金属材料来铸造铜器；第二，作为被赏赐或进贡的物品；第三，战争中被俘获的物品；第四，对青铜器外表颜色的赞美。对铭文中出现的金属名称，前人和今人均不乏研究。随着近年青铜器更多的发现，铭文中的金属名称也随之增加，这对进一步研究探索金属名称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铭文中金属名称的研究，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常常有着很大的分歧，因而金文中金属名称的一些问题，还需作更深入的探索。这一研究和探索除利用传统的将金文内容与古文献、古字典相互考据印证外，今天则更增加了有利条件，它可利用科技考古的方法，来进行古代铜器的成分分析这一手段则更富有成效，它增加了问题结论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科技考古在我国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有着广阔的前景，这是因为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形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不断叩击着考古学的大门，促进改变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因此这门新兴学科体现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交融。

科技考古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可作用的范围相当广泛，用化学和物理方法对青铜制品成分，以及所含成分的百分比的分析，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核物理方法中的，如“X 荧光光谱分析”和“穆斯堡尔谱散射测量”等方法可以不需取样品，即可对青铜金属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防止了对古文物的破坏，因而其价值无疑是很高的。我们认为，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对古代青铜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有助于验证用传统考据学的方法得出的金文中某种金属名称属于何种金属的结论是否正确。因而科技考古中的定性分析，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其意义是不论自明的。

下面我们先将金文中的有关金属名称进行汇集和考释，确定金文中某种金属名称究竟属何种金属，提出我们的看法，结论是否正确，今后可在科技考古中进行铜器定性和定量分析，来进行验证。因而本文的写作，实际也为进一步展开的科技考古奠定基础。